

再造“基层中国”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本事研究

张 均

摘 要 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是根据丁玲参加土地改革的实际经历撰写而成,土地改革运动与小说撰写行为都可说是革命再造“基层中国”的一部分。因此,小说在对事关农民之“身”的乡村政治经济结构与事关农民之“心”的文化认同结构予以实录的同时,也对“翻身”“翻心”的具体过程予以了必要的淡化与删除处理。如此本事改写的背后,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造以崇尚平等、劳动、集体为特征的新文化的合理诉求。

关键词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土地革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丁玲

中图分类号 I20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7320(2021)02-0077-10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W128)

对于撰写《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后文简称《桑乾河上》)的目的,丁玲表示:“当时的希望很小,只想把这一阶段土改工作的过程写出来。”^[1](P45)不过这并不表明丁玲仅以“工作札记”为追求,相反,她在故事主要原型地涿鹿县温泉屯村非常注意实际生活资料的发掘与收集:“她经常去这家看看,那家聊聊,讲形势,讲政策,也关心别人家吃什么,做什么,而村里面的女人没事都愿意和她坐坐。”^[2](P42)因此,《桑乾河上》让温泉屯人深感亲切:“这本书写的大部分都是事实,虚构的地方很少。”^①依今日眼光看,此小说其实也是中共革命再造“基层中国”的组成部分。黄仁宇认为,在中国现代史上国共两党各有贡献,国民党创设高层机构,“毛泽东先生的贡献,则为看清大陆的农村,无法局部改造,只有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重创低层机构”^[3](P13)。黄的“低层”之说实近于今日社会学常用的“基层”概念,《桑乾河上》据以为本事来源的土地改革运动,无疑是“重创基层机构”最见效果的革命实践。一方面,土地改革本身是革命对于传统乡村的冲击与改造。民国乡村多沿绅治制度,以血缘或地缘关系为组织原则,但“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实行土地革命和‘村选政治’,以各级‘劳模’和‘群英’为主体的乡村新式权威逐渐掌控了乡村政治生活”,“从根本上改造了乡村社会结构”^[4](P471)。另一方面,《桑乾河上》的写作也介入再造“基层中国”的巨大历史异动之中,恰如柄谷行人所言,“‘现代文学’造就了国家机构、血缘、地缘性的纽带绝对无法提供的‘想像的共同体’”^[5](P221)。这双重“再造”注定了《桑乾河上》的复杂性与多质性。那么,考量丁玲对于土地改革本事的建构过程,探究《桑乾河上》如何处理实然与应然的关系,无疑是理解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基层中国”形成之关系的极佳观察点。

一、传统乡村的“身”“心”结构

《桑乾河上》想“写中国的变化,写农民的变化与农村的变化”^[6](P159-160),再造“基层中国”的努力,在逻辑上必始于对传统乡村社会的叙述。那么,丁玲从怎样的角度理解传统乡村的呢?陈明回忆,“丁

① 选取自2014年8月6日笔者采访赫贵文(温泉屯村丁玲纪念馆馆长)的录音记录。

玲曾经说,农民‘翻身’如果不彻底,生活仍然是可能过回去的;而彻底翻身,就需要农民‘翻心’。”^[7](P94)所谓“翻身”,指乡村权力结构之迁移以及下层民众在经济上“向上翻身”;“翻心”则指民众心理在自我身份认同与秩序认同等层面从“老理”向“新理”转变。显然,这是比启蒙视角的国民性批判更见深刻的历史观察。不过,这并非丁玲的个人发现,而是源自1940年代后期中国共产党对土地改革的基本要求。在解放战争期间,土地改革是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土地改革若求成功,则必须解决乡绅阶层对于乡村漫长的“寡头统治”,这就涉及如何正确处理“翻身”与“翻心”关系的问题。1947年,冀东十四地委在报告中指出:

翻身必先翻心,不翻心就不能翻身……经验证明,凡是翻心运动深入(翻心翻透)与广泛(包括中间与落后群众)的地区,地主是全部消灭了……凡是翻心运动不深入不广泛(只翻了几个村干或积极分子的心)的地区,有的地主打击不彻底,有的封建富农漏网未斗,群众仍是懒洋洋的。^[8](P222)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所形成的宝贵乡村工作经验。无论“翻身”还是“翻心”,皆涉及土地革命前中国乡村长期存在的对农民发生控制作用的社会结构。《桑乾河上》从两个层面呈现了暖水屯里存在的此种社会结构:一是事关农民之“身”的政治经济结构,二是事关农民之“心”的文化认同结构。

(一)对事关农民之“身”的政治经济结构的呈现

在此方面,《桑乾河上》具有文学史上前所未见的精确性与深刻性。《桑乾河上》精确呈现了以钱文贵为首的“八大尖”对于暖水屯的统治,其中居核心者是钱文贵(更有势力的大乡长许有武外逃)。钱文贵并非最具财富(土地),而是胜在与地方权力网络的积极关系:他同保长、县府官员甚至日本人都有关系,是谙熟关系学、长于运作,以此成为“在政治上统治一个村”^[9]的强势人物:“他不作官,也不作乡长、甲长,也不作买卖,可是人都得恭维他,给他送东西,送钱。大家都说他是一个摇鹅毛扇的,是一个唱傀儡戏的提线线的人。”^[10](P11)八路军来后,他让儿子参加八路军,让女儿嫁与村治保主任,鼓励侄女与农会主任恋爱。这些布局使他依然保持统治地位。对此,李子俊女人看得透亮:“你们天天闹清算,闹复仇,守着个汉奸恶霸却供在祖先桌上,动也不敢动!”^[10](P274)仅次于钱文贵的,是担任甲长、性格阴险的江世荣。这“几个有钱有势的人”相互交援,形成了暖水屯硬性的结构性统治。显然,这种描写与《白鹿原》大异其趣。《白鹿原》中乡绅统治主要建立在对儒家道德以身作则的践行之上,而非政治经济优势。比较起来,《桑乾河上》抓住政治经济优势,恐怕还是比凸显道德声望更贴近当年“基层中国”的普遍事实。韩丁曾描述山西张庄“八大乡绅”的政治经济统治,其情形与《桑乾河上》“八大尖”统治实在是非常相似:

这个集团在重要事务上进行协商,采取一致行动,并支持由他们挑选的人出来管理村政,实际上垄断了村里的全部权力。……申、范、师、郭这四家是为首的。他们不仅取得了别的富户的支持,而且把一部分中农甚至贫农也拉拢到他们一边。这些人替他们当差办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分赃。至于其他老百姓,那就正如同乡绅墓前的石龟一样,背上镇着石碑,永世不得翻身,地主对他们采取的是愚弄、恫吓和分而治之的策略。^[11](P51)

这背后,是基层中国政治经济结构的典型样态。在传统帝制时期,中国的基本政治架构“于统治形式为君主制,于行政运作为官僚制,于权力结构则为郡县制”,而其间政府与乡村之关系“可从两句古话中窥见一斑。一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表明君主权威至高无上;一曰‘天高皇帝远’,表明王权并非无所不能,除征收赋税及维持秩序之外,亦无意干预乡村社会的日常运行”^[12]。这种“王权不下县”、乡村事务主要由地方权威负责的自治状态,被社会学家以“双轨制”“上下分治”“皇权无为”“绅权缓冲”“长老统治”等不同概念予以解释。但这种统治结构在民国时期出现两种变动:一是民国以来,历

届政府都努力将权力下延,希望通过区级组织建设逐步突破绅治,扩大提取乡村资源的能力;二是科举制度废除以后,传统士绅阶层逐渐没落,新式读书人向城市流动。两相交集的结果,即出现所谓“国家政权内卷化”的情形。其中,“公正之士,高蹈邱园,必多方敦请,始允与闻县事”^[13](P1039),于是,“土豪劣绅”遂成当年“基层中国”的主要支配者。这些土豪劣绅还往往演变为“赢利型经纪人”,“一村的乡绅便是一村的军阀,这些土豪劣绅在农村之中包揽一切地方公务,霸占祠族庙宇及所请慈善团体公益团体的田地财产,欺压乡民,剥削佃农”^[14](P102-103)。钱文贵、江世荣等所行所为,正是赢利经纪人的例行行为。当然,以中国乡村之广,较此更糟糕的绅治也是存在的,如淮北区长(由乡绅担任)的威势,就非一般华北乡绅可比,“(他们)总是有十多个带盒子炮的卫兵跟随着,前呼后拥,威风凛凛”,“而且擅操生杀予夺之权”^[15]。其间地主与农民关系近于欧洲中世纪庄园主或西藏贵族之于农奴的关系。势力庞大的地主为所欲为,如盐阜大地主柏连聪在柏姓农民家中吃饭,见其女生得漂亮,竟当众抱到房中奸污^[16](P438)。其恶霸行为,黄世仁大不能及。不过就全国而言,这类土皇帝与白嘉轩式“公正之士”,都是小概率存在。《桑乾河上》之所叙者,则为民国乡村社会的一般情形。

(二) 对事关农民之“心”的文化认同结构的呈现

《桑乾河上》述及的文化认同包括三层。一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宗族认同。这既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亲近关系,也包括同宗、同族之间的恤助关系,如侯忠全住“到侯殿魁的两间破屋里去,算是看在一家人面上,没要钱”^[10](P140),又如任国忠安慰惶恐的“年轻的地主”李子俊:“你的佃户,同姓的又多,说来说去都是一家人。”^[10](P191)二是以地缘为基础的乡里认同。“所谓地缘关系,即不同家族同一地域聚居而存在的关系。暖水屯二百来户人家不是亲戚便是邻居”“由于这种关系,斗争地主时,屯里的农民往往拉不开情面。”^[17]三是事关灵魂皈依的宗教认同。暖水屯既有寡妇白娘娘请“白先生”等类似扶乩的民间活动,也有侯殿魁宣讲的“一贯道”,说是“荒乱之年,黎民遭劫,入了道,可以骑烈马上西天”^[10](P144)。这三层文化认同在小说中有力地支持了政治经济统治结构,如佃户郭柏仁去向李子俊女人讨要红契时,女人一哭,他就彻底放弃:“咱们都是老佃户,好说话,这都是农会叫咱们来了。红契,你还是自己拿着,唉!”^[10](P229)侯忠全更彻底屈从于自己的命运:“(他)把一切的被苛待都宽恕了,把一切的苦难都归到自己的命上。”^[10](P141)

那么,《桑乾河上》刻画的这些文化认同,是否符合乡村真实呢?应该说,小说中秘密宗教皆有事实依据,“白娘儿都有原型,每个村都有一个能掐会算的,能看风水、闹巫的,当时(温泉屯)村里没什么娱乐活动嘛”^①。而一贯道在1940年代兴盛于全国,其教义杂糅儒、道、佛及耶稣教。但是,对此类文化认同的价值判断却分歧甚大。以《白鹿原》眼光看,这些以血缘、地缘为基础的文化除个别为邪乱之举外,其他多为“教民以礼义”的“治本之道”^[18](P93)。《桑乾河上》则显然持否定态度,视之为软性统治,认为农民如果都信守此三层认同,乡村统治结构就永远不会改变,也无需改变。那么,哪种态度更接近事实呢?比较起来,还是《桑乾河上》更令人信服。韩丁在《翻身》中称:

地主的统治是靠几根支柱撑持住的,其中重要的一根就是传统。数千年来的儒家学说造成了一种舆论,使全村很少有人、甚至根本无人对现存的制度提出疑问。……有钱人之所以有钱——他们这样开导佃户——是因为他们吉星高照;而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一出娘胎就生不逢辰。……(地主)有意识地宣传这类思想。他们积极支持用各种方法和手段向人们灌输“正统观念”。……过年唱戏,宣扬的是“善恶报应”;“孔圣道”大力提倡祭祖,并且请神婆来扶乩;“北老社”则宣扬佛家听天由命的消极思想。^[11](P51-52)

此种看法颇为清醒。本来,在“自耕农沦为半自耕农,半自耕农沦为佃户、雇农,以致十村九困,十家九穷,土地集中之趋势,渐次形成”^[19](P1006)的局面下,民国乡绅阶层要控制农民几乎是“自然天成”,

① 选取自2014年8月6日笔者采访赫贵文的录音记录。

因为被统治者的理智选择是臣服,而非抗争,“无论是迫在眉睫的灾难,或只是‘颜面’问题,维持与乡村名流的关系都比维护与普通农民的关系更为紧要”^[20](P510)。在此情形下,如果文化还进一步将顺从秩序的价值观作为“天经地义的又简单不过的事”^[18](P79)输入农民的心灵世界的话,乡绅阶层就“将大众置于那些使主导和压迫的社会关系显得自然,因而将‘真正的’生存条件神秘化的那些意识形态之下”^[21](P356)了,其统治就更稳如磐石。

对以上两层扼制农民“身”“心”的乡村社会结构的发现,使《桑乾河上》达到了新文学前所未见的深度。此前,鲁迅及“乡土文学”诸家虽对宗法文化的戕害多有深描,但对政治经济的不对称关系却甚少涉及。沈从文等“抒情派”将农村处理为病态都市之外的“供奉人性”之所,权绅之于乡村的政治经济控制则被不露痕迹地“遗忘”。那么,《桑乾河上》这种高精确性呈现是否意味着其写作不存在话语介入?答案是否定的。“没有记忆能够在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们用来确定和恢复其记忆的框架之外存在”^[22](P76),《桑乾河上》与《故乡》《边城》皆不例外,区别仅在于框架有异。比较起来,《桑乾河上》所依托的马克思主义框架较之启蒙、抒情框架更贴近“基层中国”的实际。此种框架对政治经济不平等的关注,对结构性不平等之下民众生存处境的呈现,可谓法眼如炬。这正是《桑乾河上》故事策略之所在。不过,马克思主义实亦有左翼马克思主义与延安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之别,《桑乾河上》对“基层中国”社会结构的发现偏于前者,这表现在它拒绝以阶级为唯一的社会区分概念。本来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但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阶级关系往往成为乡村社会及其个体的唯一的排他性准则。《桑乾河上》与此有异,暖水屯各色人物的生活逻辑都是阶级、宗族、宗教乃至乡里杂糅的结果。由此,《桑乾河上》成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本中最能呈现斯科特所言社会异质性的作品:“阶级并不是村民唯一的社会经历”“宗派、邻里和亲属纽带,也造成了各自的分裂线,而这些并不总是完全和阶级一致”^[23](P170)。可以说,左翼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方法论,使丁玲对暖水屯“前史”(尤其是基层中国社会结构)的讲述具有强烈实录特征。那么,小说有关翻转社会结构的土地改革过程的叙写,是否还具有这种几乎契合无间的实录特征呢?

二、“身”“心”再造之叙述

怎样叙写农民对于绅治之下乡村社会“根本性的权力和地位的再分配,以及原先存在于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基本社会关系的重新安排”^[24](P246),无疑是难度系数更大的叙事工作,因为“乡村地区呈现的不是一个单纯的画面,它是一个广阔的、多样化的、变幻无常的舞台”“居住着许多社会、经济、心理背景各不相同的人”“各个群体对他们各自所处直接环境兴衰的反应是很不相同的”^[20](P446)。因此,《桑乾河上》在这一层面有关土地改革本事的实录成分下降,而其话语介入更见复杂与纠结。

不过,“实录成分下降”并非说《桑乾河上》开始大幅脱出丁玲的土地改革工作经验,其实不然。由于有意记录“土改工作的过程”,《桑乾河上》对土地改革过程的叙述仍保留了较强的实录性质。这突出体现在《桑乾河上》对土地改革障碍的叙写。在小说中,文采、杨亮等工作队员进入暖水屯后,工作并未如想象般顺利,而是遭遇到两重思想障碍:一是来自地缘和血缘关系的伦理障碍。这主要指诸多农民相信“老理”,如郭柏仁去李子俊家讨要地契前说:“唉,地是人家的嘛!”^[10](P225)连张裕民见到钱文贵都是“二叔二叔的叫”^[10](P31)。二是变天思想。小说中,国共之战谁能取得最终的军事胜利,始终是悬在农民头上的一把利剑。钱文贵以此威慑农民:“你等着瞧,看这暖水屯将来是谁的?你以为就让这批泥浆腿坐江山?”“等将来‘国’军一到,共产党跑了,我看你们仗谁去?哼,到那时候,一切就该复原了。”^[10](P30)农民们更为此顾虑重重。因此,土地改革必然出现盘根错节的困难。

这两重障碍,一涉及与“心”有关的认同结构控制,一涉及与“身”有关的政治经济结构控制。究之史实,这两重障碍皆为实录。实际上,即便在土地改革基本完成时,温泉屯农民仍不那么主动:“出乎土改

工作组意料的是村民们对分配胜利果实的态度,并不如想像般的那么积极。”^①那么,农民何以面对翻身大事不甚积极呢?当地文化工作者谷新声认为:“人家的土地是祖上留下来的,就是银子买来的,咱们分人家的合适吗?”“本乡本土的,祖祖辈辈东家是东家,佃户是佃户,分了以后咋见面呢?”^[25](P26)赫贵文则将变天思想指认为重要原因:“万一国民党打回来怎么办,这种想法占很大的一部分。”^②更广泛的史料显示,宗族、乡里、宗教的障碍作用是全国性普遍现象,“先行土改的陕北根据地”“屡屡发现宗族传统是共产党阶级路线的最大障碍”^[26](P85-86)。至于变天忧虑,不但普遍,甚至在新中国成立后还如幽灵般存在。据载,解放初期湖南沅江地区开展土地改革:

有的地主暗地里威胁贫农积极分子说:“还记得民国十六年吗?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呀!”有的地主利用金钱、美女,收买个别立场不稳的人,为他们做探听风声、通风报信的“包打听”和疏散钱财的“防空洞”;还有的地主利用宗族、宗教和青、红帮会等关系,暗中大搞反革命串联,妄图进行武装暴动……有些苦大仇深的老实贫雇农,他们顾虑重重,有苦不敢倾吐……(甚至)只要望着土改干部一走来就远远地躲开。^[27](P35)

事后观之,这几乎匪夷所思,然而历史正是如此。这意味着,变天是较“老理”更为严重的土地改革障碍:农民几乎在任何时候都不敢与乡绅阶层公然对抗,哪怕是人民解放军已将其军事力量驱逐到台湾。对中国农民的这种惮于反抗,Arthur H. Smith 也甚感不解:“难以理解的是,一群无家可归、饥饿难忍、处于绝望境地的逃难者,在遭受洪灾或饥荒沉重打击的土地上到处流浪,为什么不在自己遭受毁灭的地区团结起来,向有关州县官员索取一些救济呢?”“我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询问处于饿死边缘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这样做?所得的回答毫无例外,都是‘不敢’。”^[20](P443)何以不敢?韩丁有深具历史感的解释:

在地主阶级统治的两千年内,一次又一次的反叛都被镇压下去了。率众起义的首领们,不是被收买,就是被砍头;他们的追随者则被活活地剥成肉块、烧死、剥皮,或活埋。太行地区的地主曾经得意地向一些外国来访者出示过他们用人皮制成的物品。这些事件和这些回忆就是中国农民文化遗产的一个组成部分。^[11](P59-60)

以此而论,农民对于变天的恐惧确实有历史和现实根据。因此,《桑乾河上》准确地将变天思想列为小说再造叙述的核心问题:“(当)全国解放战争马上就要燃烧起来的时候,如何使农民站起来跟我们走,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所以我在写作的时候,围绕着一个中心思想——农民的变天思想”^[6](P160)。

可以说,《桑乾河上》对于变天、“老理”两层心理障碍的把握极为精确。当时华北土地改革有明确指示:“贫苦群众也有的存有‘正统’与‘变天’思想,如有的说:‘人家的肉安在自己身上长不住,穷富在命’;‘斗争了人家,国民党过来了呛不了。’故工作一开始,首先要打破群众思想上的障碍,启发阶级觉悟,让其翻心。”^[8](P98)这就把“翻心”设置为“翻身”之前提。因此,“启发—觉醒—反抗”就成为小说讲述农民从“旧世界”转向“新世界”的内在机制。为此,丁玲几乎实录了当年访贫问苦、思想启发、农民也因此逐渐觉醒的事实。如对郭柏仁“地是人家的”的说法就有农民反对:“人家的,人家的,你十二年的租子,还买不下那几亩地!”^[10](P225)这些个体觉醒的汇聚,最后汇成农民的群体反抗。“基层中国”由此再造。可见,此种思想性再造机制与当年土地改革逻辑比较接近,但最大疑问也在这里:温泉屯土地改革的完成真的只是或主要是依赖丁玲等苦口婆心的“翻心”工作?细读《桑乾河上》,可发现一些与思想觉醒毫无关系的信息:“参加的人一加多,那些原来有些怕的,好像怀了什么鬼胎的人,便也不在乎了”“河流都已冲上身来了,还怕溅点水沫吗?”“如今只怕漏掉自己,好处全给人占了”^[10](P280)。这显然是农民关于风险与收益的实用主义权衡。考之温泉屯史实,可知有两层与此相关的翻身本事被《桑乾河上》予以特殊处理。

① 据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2年12月12日播出的《暴风骤雨:元宝村土改纪事》。

② 据2014年8月6日笔者采访赫贵文的录音记录。

一是删除军事配合行为。据张裕民原型曹永明之子曹树林透露:“(开始)长工、短工、贫下中农根本不敢分。斗地主的时候也不敢参与,后来工作组联系上了南面大山里的游击队,游击队到村里做宣传,为土改保驾护航,这样百姓一看有游击队撑腰,就开始斗地主、分田地了”“游击队白天来村里开展工作,斗地主,晚上就撤回山里”^[28]。这支游击队的队长即是小说中章品原型张雷。《桑乾河上》重点描写了章品对暖水屯土地改革的指导,但从未提及他带队伍、以枪杆子保证土地改革进行之事。小说甚至提到章品曾领导游击队,但出现在暖水屯的他只是“单人匹马的走”^[10](P325)。这是有意识的淡化处理。实际上,类似武装配合之举不仅是温泉屯的客观事实(丁玲等工作队撤离后张雷继续领导涿鹿土地改革),而且也是华北土地改革在国共拉锯地区鼓励并采取的得力措施:

(土改)这一斗争的开展,离开武装斗争是困难的,因此必须注意建立与加强群众武装。这些地方群众武装的名义与形势【式】不一定机械的叫“游击小队”或民兵,基本上应根据群众的需要和自愿组织“解放队”“翻身团”“获地队”等。因为这些名称的群众武装最能与群众切身利益相结合,更能获得广大群众的热爱和拥护,更适合广大群众的斗争需要。^[8](P134)

由此可见,在实际土地改革工作中,武力优势(哪怕局部优势)是与“翻心”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措施。事实上,温泉屯土地改革的最后完成,有赖于张雷组织的“护地队”:“护地队【是】保护老百姓的土地的”“(张雷)经常就下来在【这】召集这支部的书记”“宣传党的政策,有什么国民党还乡团骚扰了,他们给出点主意想办法”^①。《桑乾河上》在结尾时虽提到“翻身”农民去帮部队修筑工事,但“枪”的问题毋宁是被处理为土地改革的结果而非原因。

二是回避和淡化土地改革之“非革命”史实。回避是指删除华北土地改革中较多存在的流氓无产者投机现象。赵俪生回忆:“(赵德尊)1947年在河北平山全国土地会议上发言,竟敢在那么些大人物面前说,土改中积极分子80%是流氓。我佩服他的勇气。”^[29](P141)相关史料也多不胜数,如“(党员李永祥)由于男女关系混乱,不好好生产,种的地大部是草比庄稼高,上级以棉换布时,叫他织布,在大会上公开抵抗不织,且说:‘坐了禁闭也不织’,个人光棍好吃懒作,走到谁家吃谁家的,有‘农狗’之称”^②。丁玲对类似事实应有所历闻,但《桑乾河上》仅淡淡涉及,如“老秀才这次又写了黑头贴子到县上去,告村干部是‘祸国殃民、阴谋不轨’,说他们是傀儡”^[10](P18),“听说地还没分,多少好绸缎被子都已经放在干部们的炕上了”^[10](P69)。不过此种涉及多限于日常自私而没有上升到违法或反伦理程度,虽提到张裕民“曾有一个短时期染有流氓习气”^[10](P61)、“逐渐腐化了了的张正典,对生活已经有了享受的欲望”^[10](P69),也未为他们设置具体流氓行为。

以上两层删除和淡化,无疑削弱了小说反映现实的力度。那么,丁玲为何如此处理?当有两层原因。一是“启发—觉醒—反抗”叙述机制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叙事设置中,“新世界”的开启必须以对阶级、国家和历史正义的领悟为途径,但上述史实显示了另一真相的存在:无翻心亦可翻身,即农民在未“生成积极参与革命的价值诉求和作为革命阶级成员的集体认同”^[30]的情形下也会藉武力优势投身分地、分财,甚至“农狗”之类的人物不过是把革命看成可利用的谋取经济、权力或性资源的机会。由此可见,中国革命经历了怎样的艰难——它正是在长期与各色投机群体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中完成“自我净化”并实现自身阶级解放、国家富强的目标的。但对叙述而言,引入这类“非革命”的复杂性,无疑是风险系数甚高的问题,故将它们零散化、边缘化处理是最宜选择。二是社会主义文学叙事伦理所致。《桑乾河上》兼有以文字参与“新世界”创建之价值。中共革命眼光阔大,重翻心过于翻身,其原因即在于它要通过思想觉悟造就无数无私新人进而创造公平、富强的新国家。在革命的视界里,钱财收益(哪怕杀富济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用马克思主义“新理”重新理解历史、改造现实。故丁玲即便深晓农民未必

① 此处所引材料,据凤凰卫视“凤凰大视野”2012年12月12日播出的《暴风骤雨:元宝村土改纪事》。

② 据河北省档案馆所藏《平山县六区冷泉村土地改革检查报告》,馆藏编号:520-2-651-1。

有兴趣翻心,即便知道枪在土改中起到决定性作用,她也需要淡化、删除此类信息,进而引导读者从阔大的历史正义来理解“中国的变化”。此即理查德·艾文思所言“在掌握特定条件的基础上,历史学可以被用来预测未来,从而塑造未来”^[31](P56)。

三、作为寓言的暖水屯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具有强烈未来主义倾向,不太强调艺术真实与自然真实的高度契合。1934年,日丹诺夫如此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这种描写并不是烦琐的、死板的、也不只是作为‘客观的现实’来描写的,而要把现实按它在革命发展当中的情形来描写。并且,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和以社会主义的精神在思想上改造及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相结合”,文学“应该善于展望我们的明天,这并不是乌托邦,因为我们的明天,是由有计划的、自觉的工作在今天已经准备好的”^[32](P19-21)。应该说,此种对“真实”的理解,非常切合《桑乾河上》“身”“心”再造叙述中的本事改写。而处在再造叙述中心的暖水屯,越近于土地改革的完成,就越具有国家民族寓言色彩,亦越多承担现实中国乡村问题的“象征性解决”的重责。这意味着在暖水屯逐渐演变为“新世界”的最后阶段,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仍会深度介入小说对土地改革史实的实录和改写。

对应于硬、软两层乡村社会结构,《桑乾河上》也从两个层面呈现了清算斗争之后逐渐凸显的“新世界”图景:一是政治经济结构的翻转。小说中随着钱文贵倒台,“八大尖”彻底丧失了旧有统治地位,一批出身贫苦农民的“新式精英”走上前台:“村长江世荣已经撤消了,赵得禄当了村长,叫李宝堂郭富贵做村副”“农会还是程仁。”^[10](P446)新的基层政权的建立,意味着统治中国乡村千年之久的乡绅阶层永久逝去,也意味着“王权不下县”“上下分治”政治治理模式的结束。二是文化认同结构的翻转。这指建立在血缘和地缘基础上的宗族、乡里、宗教等认同逐渐被阶级认同整合并取代。在小说中,诉苦是翻转关键:“土改前乡村社会中的分化和农民的疾苦是客观存在,但这种种痛苦弥散于生命之中通常无处归因。通过诉苦,农民开始将苦难归因为地主的‘剥削’”,由此,诉苦“重构了农民与周围世界、与新的国家的关系”,“昔日生活在宗法秩序中的农民在自身破除樊篱获得解放的同时,通过阶级这个分类范畴与更宏大的‘国家’、‘社会’进程建立起联系”^[33]。这中间,侯忠全的“醒过来了”具有寓示之意:“(他)一面揩着眼泪,一面回忆起他一生的艰苦的生活”,他曾“把真理放在看不见的下世”,“可是,现在,下世已经成了现实,果报来得这样快呵!”^[10](P417-418)在新的文化认同中,传统的邻里互助、马克思主义的平等哲学都得到凸显。关于后者,富农胡泰也认为“过去捐税大,坏人多”,“如今讲的是平等,有话就能说,有什么不好?”^[10](P410)如此“身”“心”俱变,暖水屯的故事就自然成为“新中国”的故事。

那么,《桑乾河上》关于翻身翻心以后的“新中国”故事在多大程度上接近史实呢?就翻身而言,实录成分较重。曹树林称:“(土改)那变化简直就是翻天覆地、天壤之别。土改前我们家无房无地,只能给地主家当长工,即使我们干活实诚,可得到报酬根本不够吃饭,随时都有饿死的可能”“(土改)共分了三亩葡萄地,三亩河滩地,三间正房,三间南房,还分了一匹大马,当时家里感觉一下子成了富人”“每个村民都乐得合不拢嘴”^[28]。丁玲也回忆说:“村子里的人们欢腾的开过了土地回家大会”“月亮象水似的涌入每一个小院,温柔的风轻轻送来秋天的花香,在每一个小院里我看到了希望和肯定。”^[6](P140)此外,新旧乡村精英之间的新陈代谢也与小说无异。不过细究史实,可发现仍有某些重要翻身本事未能进入小说。一是军事胜负未定之际农民、地主、共产党之间的“非阶级性”关系。其实,土地改革前后,涿鹿地主、农民都在谋划宗族、乡里意义上的合作,“合作”不成则彼此都陷入忧惧:

中小地主都逃跑了,都跑了敌据点去。据说涿鹿几座大店全住满了地主,住吃皆无,有的地主给我们捎信,有的地主向农民订同盟,“八路来了,你就说改革了,敌人来了我就说你已退了”。还有些地方,农民地主都不敢要地了,许多山药谁也不敢收(如桃花一带),我们武装

活动强的地方,农民见到我们就哭,不叫走。武装活动弱的地方有些是相持的。〔8〕(P147)

可见,农民翻身的完成,根本上还是取决于战争胜利,而非民众的自我组织与斗争。二是新式精英之于乡村的操控。对此,丁玲不愿叙述。其实,土地改革期间革命腐败并不鲜见。赖若愚曾指出新中农(主要是土地改革后经济地位上升且担任领导职务的积极分子)的问题:

农民的思想在他上升的时候就变得快,当他下降的时候就变得慢。新中农在政治上是拥护共产党的,他们有一种“报恩思想”,报共产党的恩。可是他们对群众的关系就是新统治者。他们为了报党的“恩”,常常代表党向群众“讨债”(什么事情也质问群众“谁给你翻的身呀?不是八路军你有今天?”)一般表现对工作“热心”,而对群众非常厉害,实际上帮助党脱离群众。〔33〕(P237)

问题是,“对群众非常厉害”往往并不限于工作作风,类似《古船》中赵炳、赵多多的所作所为会不会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呢?这些消极现象,对体制、人性皆有洞察力的丁玲不会一无所知。实际上,《桑乾河上》对“感到风暴要来”“感到大厦将倾的危机”〔10〕(P271)的“丰满”“白嫩”的李子俊女人的描写,多少透露出了这些方面的隐忧。但丁玲终究不愿实际上也不能重返《在医院中》《“三八节”有感》的写作立场,新统治者的问题自然随之隐失。

与翻身本事重构相似,《桑乾河上》有关翻心本事的改写也存在一定复杂性。小说在农民庆祝土地还家的喜悦中写了两层翻心:一是侯忠全等对旧世界文化认同的告别;二是农民对自私自利等人性弱点的克服。两者都指向新的文化认同的产生:就村庄而言,表现为“对自己伙要让,要彼此相让,这样才会团结得好”〔10〕(P423)。就国家而言则表现为对党的感恩。这是以阶级、国家之大历史重建农民个体的精神世界、再造“基层中国”值得期待的结果。考之史实,这的确是温泉屯村的事实,“每个村民都乐得合不拢嘴,很多家里全部供上毛主席像”〔28〕,也是华北土地改革普遍的事实,“(农民们)生平第一次感觉到多少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了。他们睡在自己的房屋里,走在自己的土地上,撒着自己的种子,盼望着自己的收成。他们不欠任何人粮食,也不欠任何人钱”“被逼着卖掉儿子,并且自己也曾被卖掉两次的武魁媳妇,用一句话概括了自己的心情:‘我像是由地狱进入天堂了’”〔11〕(P176-177),“他们家家户户去掉了灶王爷,挂上了毛主席像。门口的横联是‘劳动门第’,而不是‘诗书门第’”〔8〕(P201)。但以崇尚平等、互助、劳动、集体特征的新文化认同的建立,却还是比小说复杂得多。其实,直到土改结束第一层翻心都未结束,第二层翻心只能说略有触及。前者表现为农民与宗族、乡里等旧认同千丝万缕的联系,有时仍用旧的乡里感受判断历史,比如,“村民们暗地里会觉得对顾家和李家有点不公平”“他们仍然保留了自己基于生活经验的逻辑,分到的地并没有去种,树上的果子,摘了之后也都在家里放着,没有吃,也没有拿去卖”〔34〕。不过从社会学眼光看,这倒是革命与乡土关系的常态:“新制度的威力只是压抑了继续潜在的宗族力量”“一个有几千年长久的传统秩序是不会断然消失的”“在同宗内地主被打垮后,同宗农人的认同仍是强有力的”〔26〕(P95)。究其原因也不复杂,因为“中国人的交往圈主要是熟人社会”,出于血缘和地缘关系的作用,“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里乡亲在其社会关系中首先需要面对的问题,是保持彼此往来的和谐与稳定”〔35〕(P141)。这注定了旧的宗族、乡里关系的持久力量。对于后者(克服自私等人性弱点)的处理,《桑乾河上》不免失之轻巧。譬如,小说中“这些自私自利的人”(指村干部)主要限于“为芝麻大一点地,就闹不团结”〔10〕(P430-431)的琐细毛病,而且较容易地就在自惭中得到纠正。至于《古船》《白鹿原》《故乡天下黄花》中频频出现的“革命者”玩弄革命于股掌之上的现象,则基本上不曾涉及。

可见,《桑乾河上》对于暖水屯背后“新中国”寓言的叙写,无疑存在较多删除与虚构。而在有关翻心翻身的乡村再造过程的讲述中,以及对革命之前乡村软、硬社会结构的还原中,都既存在与本事真实高度契合的部分,也不时与客观的现实之间出现缝隙。如此本事重构的背后,与丁玲写作之时土地改革

的诸种问题尚未充分暴露有关。比如,在工作队撤离温泉屯以后,“大部分地主”“都反攻倒算”“死了好些共产党员”“张雷成立护地队,又把这些‘人’‘砸血脖’”^①一类的事情,丁玲写作时并不了解。但更主要还是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有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叙事诉求,在于“必须把‘中国’造出来,将处于自然状态、纷纭复杂的传统中国社会讲进一个有开头的有结尾的故事中去”^[36](P28),而土地改革正是中国共产党“组织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包括翻转“低层机构”、重组乡村基层政权,也包括创造崭新的以崇尚平等、劳动、集体为特征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后者之重要,甚至超过前者。故《桑乾河上》书写“新世界”时以未来主义方法,有意取舍本事而构制相对理想的“我们的明天”,大约是可以理解的。也因此,与多数 20 世纪 50 年代至 70 年代文学一样,《桑乾河上》在再造“基层中国”时也存在写新不如摹旧的弊病。不过,即便丁玲生在今天,她恐怕也不会认可在“告别革命”思潮中借势而起的文化保守主义,在后者笔下(如陈忠实、张炜、李锐、方方等涉及土地改革或革命的小说)，“旧有体制往往会在人们的记忆中得到美化,或者由于现存的不平等现象而恢复声誉”^[37](P17),但对丁玲这一代革命知识分子而言,“现存的不平等”正是发生在乡绅与民众之间硬、软双层控制型社会结构。随着中产阶级文化逐步获得当今社会的文化领导权,《桑乾河上》的记录与再造“基层中国”的努力亦日见珍贵。这不但指它可为今日知识界“重建乡绅文化”的呼吁提供有益的反省视角,也可以见证中国现代文学曾经有过的不驯从于现实的特异品质。

参考文献

- [1] 丁玲全集:第9卷.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2] 刘雅静,陈文惠.“曹永明”桑乾河畔忆丁玲//涿鹿县政协.情注桑乾河(内部资料),2004.
- [3] 黄仁宇.大历史不会萎缩.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
- [4] 王先明.乡路漫漫:20世纪之中国乡村: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
- [5] 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6] 袁良骏.丁玲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
- [7] 陈明.我与丁玲五十年——陈明回忆录.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0.
- [8] 河北省档案馆.河北土地改革档案史料选编.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90.
- [9] 丁玲.关于《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的写作.人民日报,2004-10-09.
- [10] 丁玲.太阳照在桑乾河上.广州:华南人民出版社,1951.
- [11] 韩丁.翻身——一个中国村庄的革命纪实.韩惊译.北京:北京出版社,1980.
- [12] 李里峰.乡村精英的百年嬗蜕.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17,(1).
- [13]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县政概况(内部资料).1934.
- [14]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国现代经济史组.第一、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土地革命斗争史料选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
- [15] 宋之英.寿县一瞥.自觉,1933,(8).
- [16] 华东军政委员会土地改革委员会.江苏省农村调查(内部资料),1952.
- [17] 万直纯.《太阳照在桑乾河上》中的农村宗法社会.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0,(3).
- [18] 陈忠实.白鹿原.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
- [19] 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
- [20] 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北京:九州出版社,2018.
- [21] 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2]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毕然、郭金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23] 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郑广怀、张敏、何江穗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7.
- [24]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① 2014年8月6日笔者采访赫贵文的录音记录。

- [25] 涿鹿县政协. 情注桑乾河(内部资料), 2004.
- [26] 庄孔韶. 银翅——中国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0.
- [27] 湖南省沅江市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沅江文史资料: 第 7 辑(内部资料), 1990.
- [28] 探访土改典范小村: 温泉屯. 燕赵都市报, 2011-06-28.
- [29] 赵俪生, 高昭一. 赵俪生高昭一夫妇回忆录.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 [30] 孙立平. 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及其分析模式的转换. 南京社会科学, 2009, (5).
- [31] 理查德·艾文思. 捍卫历史. 张仲民、潘玮琳、章可译.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 [32] 日丹诺夫. 论文学、艺术与哲学诸问题. 葆荃、梁香译. 上海: 时代书报出版社, 1949.
- [33] 山西省档案馆. 太行革命根据地土地问题资料选编(内部发行), 2003.
- [34] 开国大土改: 3 亿农民分田立命. 新浪网, 2009-08-03.[2020-05-20]<http://news.sina.com.cn/c/sd/2009-08-03/175018355377.shtml>.
- [35] 翟学伟. 中国人的关系原理: 时空秩序、生活欲念及其流变.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36] 李杨. 抗争宿命之路.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3.
- [37] 雷蒙·阿隆. 知识分子的鸦片. 吕一民、顾杭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Reinventing “Grassroots China”

Realistic History in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Zhang Jun (Sun Yat-Sen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long novel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was written on the basis of Ding Ling's personal experience during the land reform. Both the land reform movement and the writing of novels can be regarded as part of the revolutionary reconstruction of “grassroots China”. While recording the rur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ructure and the cultural identity structure concerning the “body” and “heart” of farmers, the novel also dilutes and delves the specific process of “turning over the body” and “turning over the heart”. This rewriting is a reasonable appeal of socialist realism to create a new culture with such core values as equality, labor and collectivity.

Key words *The Sun Shines over the Sanggan River*; agrarian revolution; socialism; realism; Ding Ling

■ 收稿日期 2020-06-03

■ 作者简介 张 均, 文学博士, 中山大学新华学院中文系教授, 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广东 广州 510275。

■ 责任编辑 何坤翁